

# 汉字与中华文明传承



陶寺遗址出土的朱书陶扁壶(中国考古博物馆藏)。  
中国历史研究院供图

泱泱中华,历史悠久,文明博大。中华文明最突出的特性之一就是连续性,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我们的文明为什么会如此生生不息、历久弥新?其中原因多种多样,但汉字是不容忽视的核心因素之一。汉字源远流长,在世界文字体系中,作为古老自源的表意文字系统,只有汉字沿用至今。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汉字在中华文明传承中的重要作用。2014年5月,在北京市海淀区民族小学的墨韵堂里,总书记对正练毛笔字的孩子们说道:“中国字是中国文化传承的标志。殷墟甲骨文距离现在3000多年,3000多年来,汉字结构没有变,这种传承是真正的中华基因。”2022年10月,总书记在河南殷墟遗址考察时指出:“中国的汉字非常了不起,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离不开汉文字的维系。”

## 一、汉字与中华文明起源

文字的创制是文明出现的重要标志之一。恩格斯曾经指出,人类“从铁矿石的冶炼开始,并由于拼音文字的发明及其应用于文献记录而过渡到文明时代”。人类在经历过的几次“信息革命”中,第一次是发明了语言,人与其他动物有了分界;第二次是距今五六千年前发明了文字,从野蛮人变成了文明人。人类一旦创造出记录语言的文字,知识来源就不再受限于时间和空间,不再是口耳相传,因而知识快速积累,人智大开,社会快速进步。而没有文字的社会即使在某些方面取得巨大进步,

受到时空限制也难以向前发展,不是陷于停滞就是慢慢消亡,最终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中。

一个考古遗址,一旦发现了文字,其中的一切就是有史以来的文化,就是文明的存在。然而,每个时代的文字不一定都能保存在遗址中,距离我们年代越远,保存下来的可能性就越小。在距今8000多年的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出土了刻画在龟甲、骨器、陶器和石器上的大量刻画符号,不能排除它们具有文字属性的可能性。距今4000多年的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出土的陶扁壶上“文”清晰可见。约公元前20世纪至公元前16世纪的河南二里头文化,被认为属夏王朝时期,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陶器上也发现过许多刻画符号,有许多可以在甲骨文中找到相同或相似的字。在二里头文化之后发展起来的二里岗文化,分布地域范围大为扩展,文化类型也大大增加。属于二里岗文化最晚阶段的河北藁城台西遗址出土的陶片上刻有“目”、“天”、“止”等象形符号,河南郑州小双桥遗址出土的陶缸上有朱书的“尹”、“帚”、“天”、“束”等符号,其形体特征一如殷商时期的文字。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殷墟发现的甲骨文,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最早的成体系的汉字,它能够完整地记录当时的语言,已经是非常成熟的文字系统。自发现以来,出土的有字甲骨约有10万片,单字数量已达4000个左右,当时社会生活的很多方面在甲骨文中都有所表现。甲骨文是中华民族珍贵的文化遗产,它是研究汉字发展和中国早期历史的宝贵材料,也是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实证。20世纪初,著名学者王国维根据甲骨文验证了商代世系真实性之后,就“推想夏后氏世系之确实,此又当然之事也”,有“中国考古第一人”之誉的李济更是“把甲骨文的原始推远到公元前3000年以前了”。2017年,甲骨文正式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

西周时期,文字使用功能更加扩大,文字系统获得长足发展。这一时期主要文字载体发生了很大转变,现存主要式样是铸刻在青铜器上的铭文。这些铸刻在青铜器上的铭文,其书写程序是先刻于范坯,再经烧铸而成。东周时期,发现的文字载体日渐丰富,金文资料仍然占有相当比重,简牍、丝帛、玉石、陶器等材质也都是当时实用文字载体。特别是春秋晚期的侯马盟书、战国时期的楚帛书、楚简和秦简,保存了大量用软笔书写的文字。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汉字逐渐发展成为一个成熟的、富有逻辑性的文字系统。它具有强大的生

成新字的能力,拥有巨大的表达潜能,可以游刃有余地承担记录汉语的功能。

文字是历史的见证者,是传统的守护者,还是文明的传播者。汉字由最初的刻画符号和象形图形发展出表意、表音和形声等编码方法,突破以形表意,体现出中华民族由形象思维到复杂抽象思维的发展演变。古老的汉字见证着中华民族曲折辉煌的成长历程,成为中华文明的“活化石”。商周甲骨文和金文的形体构造往往能够直接或间接地反映当时社会生活的若干细节;春秋战国时代,字分五系——秦、楚、晋、齐、燕的局面逐步形成,秦国的篆文、古隶与东方六国的古文字并行,折射出列国争雄的历史场景;秦汉时期,繁难的小篆多应用于特殊场合,古隶和八分先后活跃于日常书写领域,与此同时,草书得到了迅速发展,凡此种种,无不是大一统国家机器有效运转、文化越发明昌兴盛的写照;魏晋南北朝时期,行书和楷书逐步走向成熟,从一个侧面反映着那个时代的风貌,《平复帖》、《快雪时晴帖》、《中秋帖》、《伯远帖》等流传千古的书法名帖映衬着优雅从容的晋代名士风度。汉字与生生不息的中华文明同呼吸、共命运,历经时代变迁而不改本色,既是中华文明连续性的重要体现,更为中华文明连续性奠定了重要基础。追溯汉字的演变历程,可以触摸到历史的脉搏,感受到中华文明深厚绵长的底蕴。

## 二、汉字与中华文明的连续性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悠久而持续。这个特点是如何形成的?我们的文明为什么能够从未间断?从中华文明的核心要素汉字可以窥见一斑。汉字是自源于中华大地、以记录汉语为主并具有多种功能的书写符号系统,是表意文字体系的典型代表。中华文明的连续性,突出表现在汉字的延续性上,汉字超越了传统与现代的界限,一直使用至今。这个文字系统虽然在形体上有所变化,但其内部深层结构从未发生根本的改变,所记录的语言古今一脉相承,所形成的文献丰富而连续。一个能读古书的现代人,如果打开2000多年前西汉人抄写的古书,阅读障碍很小,这在全世界范围内是独一无二的。日本知名学者白川静在20世纪70年代初曾说过:“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华文化就是汉字文化,汉字所具备的各种特质,给中华文化添上了浓烈的色彩。”“汉字还辐射到了周边民族,形成了一个独特的文化圈,即汉字文化圈。”

(未完待续)

(作者:李守奎,系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中国文字学会副会长。本文原载《求是》2024年第3期。)

# 80余载寮都公学为中老友谊添注脚

在老挝万象,提起寮都公学,当地人都会竖起大拇指,学校是公认的培养精英的摇篮,入学名额一个难求。建校87年来,学校曾七迁校址,历经风雨,教学却从未中断,成为老挝华文教育的旗帜。

寮都公学是万象中华理事会下属的华文学校,由老挝华侨华人于1937年集资创办。“在此之前老挝没有华文学校,寮都公学的建立让华裔孩子们有学可上。”寮都公学董事长兼校长林俊雄说,早年间华侨称老挝为“寮国”,因此将学校命名为寮都公学,初建时仅有一间教室,十来个学生。

最初学校经营非常困难,资金和师资极度匮乏,是老挝华侨华人的热心支持让学校能坚持下去。“我常开玩笑说,以前我们学校就像一座庙,有华侨华人捐款,我们就把捐款人的名字写在墙上。那时候还有位老职工,常常开着破摩托车四处为学校筹钱。”林俊雄说。

如今这种状况已经彻底改变,寮都公学已发展成当地规模最大、学生最多的华文学校,设有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和大学预科班,培养了大批优秀的中老双语人才。

林俊雄介绍,目前学校有在校生3100余人,其中80%是非华裔,20%是华裔,当地一些政府官员也将子女送入寮都公学念书,还有来自泰国、菲律宾和越南等国家的学生。

除了完善的教学设备和平民化的收费标准,寮都公学最吸引人的是双语教学模式。在林俊雄看来,教学要充分尊重和融合本土文化,华文教育才能持续发展。“寮都公学的学生修完小学和初中的老挝语课程,

要参加老挝教育部主办的统一考试,也要参加汉语水平考试(HSK)。毕业生会有两张毕业证书,一张老挝文的,一张中文的。”林俊雄说。

“我们也注重教师的本土培养。”林俊雄说,学校有40余名本土中文教师和70余名老挝语教师,很多中文教师曾到中国进修和学习;从中国来的外派教师还会定期培训本土教师,帮助他们夯实教学基本功。

寮都公学还将语言教学和文化传播相结合,让学生深入了解中华文化。林俊雄说,学校会定期举办中文歌比赛、中文朗诵大赛、中华才艺大赛等文化活动,学生们还组建了舞龙舞狮队和舞蹈唱歌才艺队等兴趣社团。

在共建“一带一路”背景下,两国经贸合作日益深化,也带动“中文热”在老挝持续升温。林俊雄说,在中老铁路、万象赛色塔综合开发区等重大合作项目带动下,越来越多中资企业落户老挝,对双语人才的需求大幅增加。

“很多中资企业配备了老挝语翻译,但仍愿意雇佣会讲中文的老挝员工,因为他们更了解当地情况,有利于业务拓展。”林俊雄说,每到毕业季,掌握中文的毕业生总被一抢而空。

现在林俊雄最烦恼的是招生问题。“想学中文的学生太多,学校条件有限,实在有心无力。去年我们招收120名学生,招生日的凌晨1点多就有人来排队报名,两个小时就报满了。”

去年11月,寮都公学新教学大楼建成,为学生提供了更好的学习环境。林俊雄说,以前50到60名学生在同一间教室上课,现在可以实现小班教学,学校还有多媒



2023年11月,寮都公学的学生们在上课。

(受访者供图)

体教室、理化生实验室、图书室和卫生室等,设施越来越完善。

“一路走来寮都公学经历太多艰辛,今天的成就离不开一代代老挝华侨华人的坚守,不管条件多么艰难,大家传承中华文化的决心不曾改变。”林俊雄说。

他表示,先辈们创建了寮都公学,每一个“寮都人”都有责任为后代有书可读接续努力。

(吴侃 来源:中新社)